

族群冲突研究:历程、现状与趋势^{*}

唐世平 王 凯

内容提要:过去 40 年来,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其首要的研究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条件下,更容易出现族群冲突或和平? 本文将 2012 年前的研究分为四个波次,据此批判性考察其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进展。文章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上而言,该领域已经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在理论层面上,该领域早已超越了三大范式的辩论(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主义),形成了新共识,即研究需要从三大范式和其他路径中抽取有效的元素来加以整合。此外,新制度主义已经(再次)崛起为该领域内一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在实证层面上,在诸如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日益精致的方法和技术以及更多、更好的可用数据集的联合推动下,学界对族群冲突原因的探索不但产生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收获了更为深入、更加丰富的知识。随后,本文着重介绍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研究,它们整合了理论和实证,代表了未来优秀研究的方向;同时指出了当前研究还存在精细化甚至有些碎片化的两种趋势。最后,文章在方法、数据和研究议题等方面指出了未来若干可能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关键词:族群冲突 族裔性 实证性 国际关系理论

引 言

族群冲突已成为世界上不安全、破坏和平与人员伤亡的最致命因素之一。根据丹尼和沃尔特的研究,全球最近数十年间 64% 的内战发生在不同的族群之间。^① 更骇人听闻的是,自越南战争以来,族群冲突导致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如发生在前南斯拉

^{*} 本文是在唐世平发表于《牛津政治学研究百科全书》(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中的“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Four Waves and Beyond”一文的基础上翻译、增补而成。中文版获得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授权。原文出处参见 DOI: 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340。感谢孙芳露博士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提的意见。感谢《欧洲研究》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Elaine K. Denny and Barbara F. Walter, “Ethnicity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1, No.2, 2014, pp.199–212.

夫和前苏丹境内的强制迁徙和大屠杀,以及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屠杀。此外,包含族裔因素的恐怖主义在袭击数量和造成的伤亡总数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种类的恐怖主义。^①

因此,社会科学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以从未有过的热情着手集中研究族群冲突爆发的原因。在这批丰富且持续增长的文献中,首要的研究问题是:在哪些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和国际条件下更容易导致族群冲突或和平?具体来说,为什么一些族群选择抵抗或反叛母国的中央政权,而另一些族群选择服从?民族主义、国族建构和国家建构这些概念与族群冲突有什么关系?国际层面的变化和族群冲突之间存在何种联系?自然资源会引起族群冲突吗?为什么族群战争往往比非族群内战和国家间战争持续更久?为什么有些族群成功获得了自治甚至独立,而另一些却失败了?曾敌对过的族群能否在暴力冲突之后和平相处?

全部回顾浩如烟海的族群冲突文献不仅难以完成,而且得不偿失,因此我们对文献回顾的范围附加两项限制:首先,我们仅仅考察与族群冲突/战争的爆发相关的文献,同时承认,更完整地理解族群冲突还需要考察冲突的持续和冲突后的和平;其次,只考察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献。因为在80年代之后,学界才取得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进步。即使有了这两项限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仍然不得不舍弃对其他优秀研究成果的梳理。

此外,出于下述三个原因,本文忽略了著名的三大范式(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主义)对于族裔性、民族(国族)和民族主义的争论。第一,最新的文献已经远远超越了这种争论。我们非常同意阿素托史·瓦尔西尼的评价:“再也没有谁真的认为族群身份是原生的了,也没有谁会认为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而仅仅能被当做战略工具使用。再也没有纯粹的原生论者或纯粹的工具论者了,由于经验证据的力量,他们再没有可能东山再起。”^②第二,结合三大范式中有用的元素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向,这种看法正逐渐成为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今绝大多数族群冲突研究者首先都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其次则是一个工具论者,同时还会承认某些原生性元素仍然在影响族群冲突。实际上,一些最新的理论整合式的研究已经尝试从三大范式中提取有用的元素并加以超越。第三,一篇简短的文献综述中难以讨论清楚上述问题,并已有若干研究对此加

^① Victor Asal and Karl Rethemey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 Lethality of Terrorist Attack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2, 2008, pp. 437-449; Daniel Masters, "The Origin of Terrorist Threats: Religious, Separatist, or Something Els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0, 2008, pp. 396-414.

^② 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and Ethnic Conflict", in Ch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91.

以简要讨论。^①

后文还将讨论若干关于内战的重要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没有区分族群战争和非族群战争,但它们对族群冲突/战争研究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族群战争和非族群战争存在根本性区别,将这两种类型的冲突混杂在一起讨论并不合理。

本文分析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简要回顾基本的概念;第二部分通过将既有文献分为四个“波次”来回顾和评价族群冲突研究的演化历程;第三部分着重介绍若干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和经验整合式研究,这类研究代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然后再指出当前学界精细化研究的两种趋势;最后,本文强调应该重视既有研究中常被忽视和误解的理论化问题,并在方法、数据和研究议题等方面为未来研究指出了若干可能的领域和方向。

一 关键概念

没有概念,也就没有科学讨论。遗憾的是,很多族群政治领域的关键概念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处理这些棘手的概念问题超越了本文的范围,在此仅提供这些概念的工作定义而不深究细节。

(一) 族裔性(ethnicity)和族群(ethnic group)

尽管对“族裔性”概念尚未达成完全的共识,但当今大部分研究族群政治的学者可能都会承认“族裔性”通常包含至少三个关键要素。首先,族裔性意味着“基于一系列如语言、文化、历史、地区和外貌等共有特征而产生的对共同起源的感知”;其次,同族裔的成员常常会赋予这些与族裔性息息相关的共同特征更深的含义;再次,这种共

^① See Rogers Brubaker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4, 1998, pp.423-452;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8;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2000, pp.845-877; 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and Ethnic Conflict”.

^② See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0, No.4, 1998, pp.563-573;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6, No.4, 2004, pp.563-595;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7, No.1, 2003, pp.75-90.

同体或群体意识可能会提供集体行动的基础。^①

对于族群,笔者采用英格尔归纳的超越三大范式的极简主义式定义,即族群是“一个更大社会的一部分,这部分的成员自认为或被其他人认为有着共同起源并共享共同文化中的重要成分,而且,这些成员还会参加那种共同起源和文化在其中构成重要组成部分的集体活动”。^②

由于族群边界通常是模糊的,学界对于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族群并没有一致意见,估计数目从数百到数千不等。能确定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的,只有小部分国家几乎由单一族群构成(如日本、朝鲜和韩国),或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族群(如法国和德国)。

(二)冲突、暴力和族群战争

唐纳德·霍洛维茨将冲突定义为“一种为达成目标同时阻挡、伤害或消灭对手的争斗”。^③但是这个定义存在问题,因为它暗示冲突一定伴随暴力。正如瓦尔西尼所指出的,冲突在一切社会中几乎是永存的,但并非总是带来暴力。^④本文同意瓦尔西尼的观点,在讨论2012年前的文献时仅仅考虑暴力性族群冲突。

同样,笔者同意并使用詹姆斯·费伦对族群冲突的定义:“暴力进攻可以在下述条件下被理解为‘族裔性的’,即它被针对其他族群的敌意所驱动,或者受害者是通过族裔标准选择的,或者攻击是在族群名义下进行的”。^⑤

族群战争是更为剧烈的族群冲突形式。只有双方都部署了军队或者民兵,暴力冲突才可以被称为战争。^⑥此外,根据常用的战争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的定义,暴力冲突必须导致超过1000人的战斗相关阵亡人数才可被视为战争。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多数的族群战争发生于一个族群和另一个控制着国家的族群之间,部分族群战争也会发生在两个都无缘国家核心权力的族群之间。比

① Anaïd Flesken, “Researching Ethnic Relations As the Outcome of Political Processes”, GIGA Working Paper, No.251, 2014, p.8; John Milton Yinger, “Ethnicity in Complex Societies”, in Lewis A. Coser and Otto N. Larsen eds., *The Uses of Controversy in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pp.197-216; Henry E. Hale, “Explaining Ethnic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7, No.4, 2004, pp.458-485; Kachan Chandra and Steven Wilkinson,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Ethnic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1, No.4, 2008, pp.515-563; Andreas Wimmer,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thnic Boundaries: A Multilevel Process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3, No.4, 2008, pp.970-1022.

② John Milton Yinger, “Ethnicity in Complex Societies”, p.200.

③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95.

④ 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and Ethnic Conflict”, pp.278-279.

⑤ James D. Fearon, “Ethnic Mobilization and Ethnic Violence”, in Barry Weingast and Donald Pitt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57.

⑥ Nicholas Sambanis, “Do Ethnic and Non-ethnic Civil Wars Have the Same Caus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qui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5, No.3, 2001, pp.261-262.

如,第二次苏丹内战期间,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努尔人(瑞克·马查尔领导下的苏丹人民解放军纳西尔派)和丁卡人(约翰·加朗领导下的苏丹人民解放军托利特派)之间的战争(1991-2002年),就是正在进行的南北苏丹族群战争中的另一场独立的族群战争。

二 理解族群冲突:四波研究

在简短的概念讨论后,本节转入对文献的考察。根据关键文献和研究进展,笔者将既有文献分为四个稍有重叠的波次。使用“波次”的标签来整理和评价既有文献,是因为族群冲突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存在明显的时代性,即受到一个时期的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或是某些重要著述的影响,族群冲突领域在这一时期内的主要研究成果在问题意识、理论构建和方法论上的相似性要大于其差异性,且总体上与其他时期的学术研究特征存在显著的差别。^①

(一)第一波(1990年以前):没有系统性证据的范式

理论上说,三大范式(也就是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主义)间的大辩论支配了第一波的研究,导致该时段中的很多文献过度抽象。而且,这一时期中大多数重要的理论家习惯于从他们最熟悉的某个特定地区选取少量案例,以此建立理论,在不与关注其他地区的区域问题专家核实和讨论的情况下,就暗示他们的这些理论具有普适性。

然而,这一波族群研究更显著的特征或许是缺乏系统性的实证证据。大多数实证分析由单一案例或少量简单的案例构成,探寻驱动族群冲突的因素和机制的严谨的比较研究几乎不存在。最典型的是泰德·格尔的《人为什么反叛》一书,发展了关于反叛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理论,并提供了一长串假设,但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实证证据给予支持。^②

此后,唐纳德·霍洛维茨的《冲突中的族群》问世了。^③ 作为一部接近700页的力作,该书毫无疑问是族群冲突领域的基础性文献。^④ 从理论上而言,霍洛维茨不但超越了三大范式,还从亨利·泰佛尔等人的群体社会心理学中吸收了营养。^⑤ 其众多理

^① 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② Ted R.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③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④ 约瑟夫·罗斯柴尔德的《族群政治》屈居其后。Joseph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⑤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33, 1982, pp.1-39.

论洞见预示了后来的许多关键性发展(如下文提到的新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该书也以领先于时代的方式明确强调了比较研究的价值。^①在实证方面,该书收集整理了三个(亚)大陆的一大批证据。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霍洛维茨几乎可以被认为是独自将族群冲突这一领域从“社会科学的一潭死水”中拉了出来,^②为族群冲突研究日后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特和繁荣的领域打下了基础。

(二)第二波(1990-2000年):中层理论和统计分析的兴起

苏联的解体和中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导致了一系列族群战争。与此同时,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的暴行震惊了全世界。这些事件的发展历程清楚地显示,族群冲突可能成为后冷战时代新的苦难之源。在此背景下,族群冲突研究的第二波兴起并迅速扩展。

第二波文献与第一波存在显著差异。^③从理论上而言,这批研究果断地从范式间的大辩论转移到了对中层理论的探索。沿着这条路径,该领域的理论通过与更为广泛的文献进行交流和对话而获得新的发展。从经验上而言,(粗糙的)基于跨国数据的定量研究开始兴起,同时,有关族群战争的新议题进入族群文献的视野。

就理论发展而言,这批文献引入了两种关键性的中层理论传统,为未来的研究打开了新天地,并启发了后续的重要研究。

首先,巴里·波森将安全困境理论引入族群冲突研究。他注意到,当一国的中央政权开始崩溃或中央政权不再中立,开始敌视、歧视或排斥一些少数族群时,国内就会逐渐出现这种事实上的、与国际无政府体系非常相似的国内无政府体系。波森强调,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恐惧以及进攻与防御行动之间的不可区分性可能会导致行动和反制行动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不同族群走向冲突。^④

第二种被引入的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在一篇被广为引用的文章中,费伦问了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如果冲突总是代价高昂,为什么国家间仍然相互攻伐?^⑤他接着列举了解释战争爆发的三个理性主义逻辑:不完善的信息、承诺问题和议题的不可

①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p.13-41.

② Ibid., p.13.

③ 在更早的一篇评论中,布鲁贝克和莱廷认为,这一波的文献没有取得什么进步,但我们和瓦尔西尼的观点一样,认为该波次研究有一定的进步。Rogers Brubaker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 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and Ethnic Conflict".

④ Barry R.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Vol.35, No.1, 1993, pp.27-47.

⑤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3, 1995, pp.379-414.

分割性。费伦还认为,族群战争最好被理解为一个承诺问题。^① 他随后与大卫·莱廷进行了长期合作,共同探索族群冲突领域,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且不局限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文章。^②

在实证分析中,有三项研究发展非常突出。

第一,保罗·科利尔和安克·赫夫勒尝试解释了“族群战争的经济原因”。^③ 基于一个包含了1960-1992年间98个国家内27次内战的截面数据集,他们发现,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力地降低了内战的可能性(和持续性)。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自然资源可能对内战的爆发产生非单调性影响:“自然资源的占有会在初始时增加内战的风险和持续性,但此后会起到抑制的效果”。作为第一项虽粗糙却系统性针对内战爆发进行持续的定量研究的成果,他们的文章一度走红。遗憾的是,该文的数据和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題,许多结果和解释后来陆续遭到批评和修正。^④

第二,主要受到科利尔和赫夫勒的发现和一系列围绕争夺大量自然资源的冲突(例如哥伦比亚的毒品和石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的钻石、南苏丹的石油和印度尼西亚亚齐省的天然气等)的启发,自然资源和內战之间的关系,又名“资源战争”或“资源诅咒”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子研究领域。这个子领域经常和“贪婪还是不满”之辩并列,强调在出现大量可掠夺自然资源时,不管是族群还是非族群的内战都更有可能爆发。^⑤

第三,注意到族群战争倾向于席卷相邻的国家和族群这一事实,学者们开始探索跨国的族群亲属关系和权力争夺怎样推动了国内的族群冲突扩散到邻近的国家或族群内,继而成为族群战争的次要原因。^⑥

(三)第三波(2000-2005年):取得有限理论进展的定量研究大爆发

第三波研究持续时间相对较短。这一时期内的文献取得了实证意义上的快速发

① James D. Fearon, “Ethnic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4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York, 1995.

②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 No.4, 1996, pp.715-735;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参见 Chaim Kaufmann, “Rational Choice and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Ethnic Conflict: A Review Essay”, *Security Studies*, Vol.14, No.1, 2005, pp.178-207.

③ 这两位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一直未区分族裔性内战和非族裔性内战,因此存在严重的缺陷。

④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On Economic Causes of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0, No.4, 1998, pp.563-573.

⑤ See Mats Berdal and David M. Malone eds., *Greed and Grievance: 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Michael T. Klare, *Resource Wars*,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1.

⑥ See 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Fear, Diffusion, and Escal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展,但往往采用非此即彼和线性的思维来理解复杂的社会科学现象,因此仅收获了有限的理论进展。

在实证上,本波研究最重要的发展也是第一项理论进展,即是三个关键数据集的引入:最初由泰德·格尔建立并在2003年得到更新的“处于风险中的少数族群”数据集(the Minorities at Risk [MAR] dataset),阿莱西纳等人发布的包含190个国家的族群数据集,^①以及费伦公布的160国比较族群数据集。^② 这些数据集和其他可获取数据(如Penn World Table)奠定了此后跨国定量分析快速扩展的基础。

第二项理论进展是关于“贪婪还是不满”的大辩论,但该辩论来得快去得也快。基于新模型和包括1960–1999年间79场内战的新数据库的分析,科利尔和赫夫勒发现,初级产品出口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提高将大幅增加内战的风险,他们将这种发现视为“机会(或贪婪?)是一种更关键的内战驱动因素”的证据。^③ 而“不满”的各项指标如仇恨、政治压迫、政治排斥和经济不平等仅具有很小的解释力。这推动了学界关于“贪婪还是不满”的争论,^④而科利尔和赫夫勒是“机会(或贪婪?)”一方的忠实拥趸。然而,到了2005年,对一些显著的“资源战争”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已经使“贪婪还是不满”的简单二分法失去立论的基础。^⑤ 事实上,科利尔、赫夫勒和罗纳最终也摆脱了“贪婪还是不满”的争论,开始强调“可行性”。^⑥

第三项进展是受到作为叛乱的内战绝大部分发生在贫穷或弱小的国家这一事实的启发,费伦和莱廷提出了族群战争的“弱国家假说”和“机会解说”。^⑦ 他们发现,贫穷、政治不稳定、恶劣的地理条件和庞大人口数量这几个变量与内战爆发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强国遏制叛乱而弱国引发叛乱。与科利尔和赫夫勒2004年文章的观点一致,费伦和莱廷也怀疑不满(用族群/宗教差异、民主和收入不平等来测量)是内战的关键推动因素的可能性。

或许这一波研究中最关键的进展是获得一种认知,即无论一项定量研究多么严格,它最多也只能揭示出相关性而非推动族群战争的准确机制。因此,就像政治科学

① Alberto Alesina et al., “Frac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8, No.2, 2003, pp.155–194.

② James D. Fearon,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y Countr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8, No.2, 2003, pp.195–222.

③ Paul Collier and Anke Hoeffler,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6, No.4, 2004, pp.563–595.

④ See Mats Berdal and David M. Malone eds., *Greed and Grievance: 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

⑤ Karen Ballentine and Jake Sherma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med Conflict: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3.

⑥ Paul Collier, Anke Hoeffler and Dominic Rohner, “Beyond Greed and Grievance: Feasibility and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61, No.1, 2009, pp.1–27.

⑦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和社会学的其他领域一样,族群冲突研究也出现了关于研究方法的共识,即结合深度且有过程追踪的案例研究与定量分析,比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更能促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① 这种认识带来了两卷本的族群战争研究论文集的问世,书中的每篇论文分别对单个案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② 与此同时,结构化的、基于过程追踪的比较案例研究也开始兴起。^③

总体来说,与第二波一样,第三波研究也未取得很大的理论进步,但产生了两项重要的创新成果。注意到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后,斯图尔特·考夫曼和罗杰斯·彼得森都开始探索仇恨、荣誉/不满、利益和恐惧在推动族群走向冲突过程中的不同影响程度。^④ 在识别了族群战争的四类“故事”(即古老仇恨、操纵性的领袖、经济竞争和非安全的螺旋)之后,考夫曼最终将沙文主义精英炮制的族群神话和恐惧认定为推动族群战争的关键性直接驱动力。同时,在正确认识到情感可以与工具理性相协调后,彼得森试图把几种关键性情感驱动力(荣誉、仇恨、愤怒和恐惧)整合进一个更合乎逻辑的族群冲突理论中。他强调,对制度性支配的不满是一个有力且深层次的族群冲突驱动力,而愤怒可能是针对外部族群的冲动型大屠杀的直接导火索。值得注意的是,考夫曼和彼得森都采用了结构化的比较案例研究去支撑他们的理论假设。

(四)第四波(2005-2012年):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和次国家研究的到来

第三波没有持续多久就迅速被第四波研究所取代,这可能反映了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和理论创新,这一波的研究特点是引入新的数据库和方法,并且开始重新讨论国家的控制这一引发族群冲突的重要机制。

理论上,出于对非常粗糙的族群分裂度(ethnic fractionalization)测量指标以及第二、三波中文献缺乏讨论族群权力关系的不满,学者们开始寻求更富有成效的族群构成测量方法,并将族群权力关系重新引入这一领域。拉斯·塞德曼、安德里亚·维默尔及其合作者共同建立并不断保持更新的“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the 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为新一代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使用该数据库的高质量论文不知

^① Nicholas Sambanis, "Using Case Studies to Expand Economic Models of Civil Wa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 No.2, 2004, pp.259-279.

^② Paul Collier and Nicholas Sambanis eds., *Understanding Civil War: Evidence and Analysis* (Vol. 2),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5.

^③ See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ger D. Petersen, *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 Hatred, 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Roger D. Petersen, *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 Hatred, 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凡几。

在实证层面上,本波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进展非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莫属。按照其定义,族群冲突是一种次国家现象。但之前的定量研究仅仅依靠国家层级的综合数据。

哈尔瓦德·布赫和斯科特·盖茨于2002年首次将基于GIS的次国家层级数据引入这一领域。^①自此之后,数个基于GIS的全球数据集就被开发出来,它们大多来自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以及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这些基于GIS的数据集包括“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s Data, 2010)”、“具有地理编码的石油和钻石数据集(the geo-coded petroleum and diamond dataset, 2007)”、“族群地理定位数据集(Geo-Referencing of Ethnic Groups dataset, 2010)”和“地理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the Geo-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 2011)”。目前,绝大多数有关族群冲突的定量研究都或多或少要使用基于GIS的数据。其结果是,我们对族群战争的理解变得更为细致。GIS的引入给这一领域带来了重大变化。

借助更加丰富和细致的数据,研究者们开始重新评估之前的实证发现。最显著的发现是第四波文献挑战了前人关于族裔性和不满并未推动族群冲突的结论,重新确立了因政治支配带来的不满和族群战争爆发之间的稳健的因果关系。^②族群权力关系再次回到学界的视野。

第四波研究中一个关键的理论发展是新研究路径的出现,可称之为“新制度主义”,因为它与旧制度主义关于协和民主制是管理族裔分裂最佳制度安排的主张截然不同。^③这种新制度主义路径复兴、扩展并整合了来自罗斯柴尔德(1981年)、霍洛维茨(1985年)和布拉斯(1991年)的不少核心理论洞见。简而言之,新制度主义路径认为,理解了那种“因控制和塑造现代(民族)国家而产生的斗争”才能理解族群冲突。对此,霍洛维茨曾作出如下有力的论断:“对国家的控制,控制一个自己的国家,免于被其他人控制,都是族群冲突的主要目标。”^④

苏联时代仅有一些少数民族得以建立制度化的共和国,并由此导致了后续的风波。受上述现象的启发,菲利普·罗德爾提出,(新)民族国家只能从“共同国家”

^① Halvard Buhaug and Scott Gates, “The Geography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53, No.4, 2002, pp.544-569.

^② Lars-Eric Cederman, Andreas Wimmer and Brian Min,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62, No.1, 2010, pp.87-119.

^③ 上述争论详见以下文献: Arend Lijphart,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Chapter 14.

^④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p.5.

(common-state)内现存的“独立州”(segmented states)产生,因为只有“独立州”才能为寻求分裂/自治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政治平台,让后者得以萌芽、发展,甚至最终在战争不可避免之时成功挑战“共同国家”。^① 罗格斯·布鲁贝克关于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成立的新国家怎样试图国族化(nationalizing)的研究,也属于同一类,虽然他并没有聚焦暴力性族群冲突。^②

三 超越第四波:理论-实证整合与精细化

经过族群冲突研究领域四波学术演进的积累,近期研究在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上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本节将首先着重介绍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研究,它们直指族群冲突背后的深层因素,即国家建构、国家内部权力斗争和政治统治,或是将深层因素与各类情绪等直接因素结合起来讨论,整合了碎片化的理论假说和实证证据,代表着未来优秀研究的方向。笔者认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才是我们一直该遵循的研究原则。其次,本节描述了第四波之后族群冲突研究的另一面,即更加精细化甚至依然有些碎片化嫌疑的两种趋势:将族群冲突细化为不同类型和解析为不同行为体的行为及其互动。一方面,这种精细化对于我们理解各类族群冲突无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过度精细化可能会导致该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失去对核心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关注。这些精细化取向的研究话题本身并不新颖,但是系统性、大范围和使用严谨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精细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一)迈向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整合

自第二波之后,理论整合就不再是族群冲突研究领域的核心关切,研究者纷纷寻找驱动族群冲突的因素和机制。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使这个领域变得更加碎片化。“从定量研究中,我们获得了很多看似将一些因素与族群战争/和平联系起来的相关关系,但往往缺乏因果机制的讨论。从定性研究中(比较案例研究),我们依赖某些因素和因果机制,发展了一些关于族群战争的具体理论。然而,目前的族群冲突研究不仅缺乏整合,而且研究族群战争的学者往往会偏爱某些因素和机制,并将后者与另一些因素和机制对立起来。在这些学者看来,仅仅用他们喜欢的那些因素和机制就能够充分地解释族群战争这个复杂现象,而且这些不同的因素和机制之间并不

^① Philip G. 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zing States Revisited: Projects and Processes of Nationalization in Post-Soviet State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34, No.11, 2011, pp.1785-1814.

存在互相影响。”^①

2013年,学界卓有成效的合作带来了两项整合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甚至可能终结了上述持续的碎片化趋势。这两部著述是赛德曼、格莱迪奇和布赫的《不平等、不满和内战》以及维默尔的《战争之潮》。^②通过拓展斯图尔特关于横向不平等的制度主义观点和罗德关于“独立州”的研究主题,并将“政治上的排斥和统治所导致的不满”作为族群战争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这两本著作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建构、国家权力斗争、政治统治和族群冲突的整合的新制度主义理论。^③此外,维默尔的理论还将国际体系的系统性变化,尤其是帝国的崩溃引入理论框架。利用几乎跨越两个世纪的原始全球数据,这些作者在GIS的帮助下进行了严谨的定量分析,并得到了支持其理论洞见的强有力的证据。他们发现,以族群为界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能导致大量的不满,进而引发族群战争。进一步而言,族群战争更可能在重大的制度变迁期爆发,如原领地被并入一个帝国时,或根据族裔的统治或排斥原则来创建民族国家时。^④同时,这两本著作对盖尔纳和安德森等人的经典作品中有关民族主义、民族建构、国家建构、现代化和族群战争的重要理论提出了严肃的质疑。^⑤

唐世平的族群战争爆发的广义理论是对该领域的一个新贡献。^⑥基于前人理论的整合尝试,^⑦他首先将诸如恐惧、仇恨、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因素视为暴力行为的直接因素,再将诸如政治制度、不平等、统治和排斥等其他引发冲突的因素当做必须通过直接因素起作用的深层因素;其次,使用“安全困境”和“族间-族内互动”两个元机制作为整合器,通过它们将众多散见于既有文献中的因素和机制包容进来,共同组成一个更加整合和动态的族群冲突理论。上述广义理论及其理论化路径,为进一步理论化其

① Shiping Tang,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Vol.33, No.3, 2015, pp. 256-279.

② Lars-Eric Cederman, Kristian S. Gleditsch and Halvard Buhaug, *Inequality, Grievances and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dreas Wimmer,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③ Frances Stewart ed.,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Conflict: Understanding Group Violence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hilip G. Roeder, *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

④ 也可参见 Harris Mylon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Building: Making Co-Nationals, Refugees, and Minor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Roger D. Petersen, *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 Hatred, 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⑤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Verso, 1983[1991].

⑥ Shiping Tang,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⑦ Donald L. Horowitz,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Violenc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2000, pp.845-877; Stuart J. Kaufman, *Modern Hatred*; Roger D. Petersen, *Understanding Ethnic Violence: Fear, Hatred, and Resent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Eastern Europe*; Lars-Eric Cederman, Kristian S. Gleditsch and Halvard Buhaug, *Inequality, Grievances and Civil War*.

他具体的族群战争爆发中的动态机制提供了有价值的起点。

另一项更近的创新性研究来自菲利普·罗斯勒。^①注意到很多非洲国家自独立后就反复陷于政变和族群战争的循环,罗斯勒认为,来自一个族群的试图占据统治地位并控制国家的尝试,以及来自其他族群的反抗,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为什么许多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长期陷于政变、预防政变和族群战争的恶性循环中。结合深度案例研究和定量分析,罗斯勒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族群政治和国家权力斗争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

(二)将族群冲突细化为不同类型

自第四波以来,族群冲突研究的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族裔性内战爆发与否的研究,在继承了族群冲突研究不断演化过程中达成的一些共识(如对中层理论和方法的重视),目前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精细的趋势。研究人员进一步将族群冲突细分为各个小类,如非暴力运动、族群清洗/种族屠杀、族裔恐怖主义和民族自决运动,进而去讨论各小类的族群冲突是否存在不同的因果发生机制。虽然这些话题并非新话题,但这些新一代的研究往往能够使用合适的研究设计和令人信服的数据,并为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提供可信的回答。

相比于暴力冲突,非暴力形式的族群冲突往往缺乏系统的研究。暴力冲突通常关注非政府的武装组织,而非暴力冲突还会讨论公民和非武装的反对派在各类运动中的作用。在全球国家间战争和内战数量同时呈现下降态势,而诸如在“阿拉伯之春”和民粹主义等事件持续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的时代,研究涵盖族裔或非族裔的非暴力冲突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研究议题中,埃里克·切诺韦思领导的公民抵抗(civil resistance)研究无疑成绩突出,他们建立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和结果”数据库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源,目前涵盖了1945–2006年以来250起以推翻政权、驱逐侵略者或争取独立为目的的非暴力和暴力起义事件。在切诺韦思与玛利亚·史蒂芬合著的《为什么公民抵抗能够成功》一书中,作者综合使用该数据库和案例研究后发现,非暴力运动存在与暴力冲突不同的机制,且比后者更容易达成政治目标,更能促进长期稳定的民主,而暴力叛乱往往并非最合适的战略。^②虽然切诺韦思等人的研究讨论并非聚焦族群政治,却能缓解族群冲突研究对“暴力”的偏爱,并提供新的思路和数

^① Philip Roessler, *Ethnic Politics and State Power in Africa: The Logic of the Coup-civil War Trap*,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② 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Erica Chenoweth and Orion A. Lewis, “Unpacking Nonviolent Campaigns: Introducing the NAVCO 2.0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0, No.3, 2013, pp.415–423.

据。例如,下文中讨论的凯瑟琳·康宁汉姆对族群自决运动中非暴力运动的研究就借鉴了切诺韦思的研究成果。

族裔或种族屠杀属于针对非战斗人员(平民)暴力的一种,历来不乏研究。例如,屠杀行为的罪魁祸首不一定是中央政府或主要族群,族裔或非族裔的武装组织在获取外部援助之后会降低获取民心的动机,因而更容易做出践踏人权的行为。^①斯科特·斯特劳斯 2015 年对非洲种族屠杀的新研究,是代表了那些具有强烈的方法论意识的好作品。^②种族屠杀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斯特劳斯认为很多既有解释过度预测了(overpredict)种族屠杀的发生,而且绝大部分研究没有系统地分析那些可能发生但最终没有发生屠杀的案例(noncases);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在明确了自己选择案例的限制条件(scope condition)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两个促进因素(战争导致不断升级的威胁和关于国家身份的初始话语)和四个最重要的阻止因素(反对话语、国家能力、经济动机以及外部因素)的理论解释框架。

以族群矛盾为由发生的恐怖主义是全球性问题,受害者包括本族群成员、其他族群成员和无辜群众。据相关统计,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恐怖主义组织(声称)为促进某些族群利益而存在,且族裔形式的恐怖主义在袭击数量和造成的伤亡总数上都遥遥领先其他种类的恐怖主义。^③有关内战研究发现,反叛群体倾向于在国家首都和边缘地区使用恐怖主义,以期惩罚政府的平叛战略并在地理范围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④但主流的恐怖主义研究总体上忽视了族群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仅有零星、不成系统的讨论。例如,布兰登·博伊兰发现,对母国的政治和经济不满,以及族群内部精英之间的斗争,都会引发族群恐怖主义。^⑤山姆布达·加塔克等人研究了民主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其结论是,政体类型对国内恐怖主义的影响受到国内是否存在政治上被排斥的少数族群的调控。当国内政治排斥存在时,任何民主国家都会出现恐怖主义。^⑥笔者认为,在恐怖主义研究基础上,探索和族裔相关的恐怖主义行

① Idean Salehyan, David Siroky and Reed M. Wood, "External Rebel Sponsorship and Civilian Abuse: A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of Wartime Trociv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 No.3, 2014, pp.633-661.

② Scott Straus, *Making and Unmaking Nations: War, Leadership, and Genocide in Modern Af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Victor Asal and Karl Rethemey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the Lethality of Terrorist Attacks"; Daniel. Masters, "The Origin of Terrorist Threats: Religious, Separatist, or Something Else?".

④ Konstantin Ash, "'The War Will Come to Your Street': Explaining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Terrorism by Rebel Group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17, Online First Version.

⑤ Brandon M. Boylan, "What Drives Ethnic Terrorist Campaigns? A View at the Group Level of Analysi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33, No.3, 2016, pp.250-272.

⑥ Sambuddha Ghatak, Aaron Gold and Brandon C. Prins, "Domestic Terrorism in Democratic States: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Minority Grievanc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7, Online First Version.

为,回答诸如为什么某些族裔武装会采用恐怖主义这类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决运动(self-determination movement)作为一个族群冲突中更小的分类,依据的并非族群组织采取的不同战略手段,而是根据族群组织的战略目的界定的。它指的是群体要求更多自治权力、独立、与其他国家统一、建立泛族裔的超国家政治实体等目的的运动,大多与特定的族群联系在一起,例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民民主党要求文化和语言自治权力的运动,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不同的政治团体对联邦主义和独立的不同要求。凯瑟琳·康宁汉姆团队对自决运动研究的重要贡献是,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自决运动的数量、内部派系竞争和战略选择等变量的数据库。该数据库表明,自决运动中的内部派别(组织)存在很大差异。平均来说,每个运动中的内部派别大约有8个,而印度的克什米尔穆斯林自决运动中则多达67个派别。在数据支持下,她们发现,内部派系竞争和中央政府具有否决权的行为体数量,影响了中央政府对自决运动的应对战略,进而决定了自决运动是走向成功还是引发冲突;^①关于族群自决运动中的非暴力运动,她们发现,小族群和地理上的分散导致族群更容易使用非暴力战略。^②进一步区分自决运动中五种不同的非暴力战略(经济不合作、抗议、非暴力干预、社会不合作和政治不合作)后,她们认为,自决运动中的组织不仅会模仿其他组织的非暴力战略,而且还会根据战略环境调整和多元化己方的战略。^③康宁汉姆等人的研究是社会科学以及冲突研究领域精细化趋势的典型代表,她们进一步将自决运动的分析单位从群体/运动层次降低为组织/派别层次。当然,研究路径是多样化的,莱安·格里菲斯将视角扩展到1816-2011年整个时期,试图将国际和国内因素统合起来解释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分离运动是另一种整合路径。^④

(三)将族群冲突解剖成不同行为体的行为及其互动

族群冲突越来越精细化的第二个特征是研究对象从笼统的冲突事件向相关冲突行为体的行为及其互动转变。族群冲突本质上涉及资源之争,对资源的争夺至少涉及控制国家的中央政府、少数族群和第三方行为体。解释这些相关行为体的行为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族群冲突的爆发动态。

^① Kathleen Gallagher Cunningham, *Insides the Politics of Self-determin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Kathleen Gallagher Cunningham, "Understanding Strategic Choice: The Determinants of Civil War and Nonviolent Campaign in Self-determination Disput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0, No.3, 2013, pp.291-304.

^③ Kathleen Gallagher Cunningham, Marianne Dahl and Anne Fruge,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Diversification and Diffu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7, Online First Version.

^④ Ryan D. Griffiths, *Age of Secessio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State Bi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首先,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最高权威体现为资源的最终分配者,对族群冲突爆发与否具有重要影响,但政府并非一定会保持公允,而是偏向某些族群,排斥另一些族群。同样,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非常重要,一些重量级研究以及后续的同类研究发现,一旦某些少数民族在政治上被排斥,国内各种形式的族群冲突的发生概率会大幅增加。^①目前,学界就关于国家为什么会采取族群排斥政策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安德烈·维默尔比较了法国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后,认为民族国家在建立过程中,如果缺乏制度能力(包括中央集中化程度不够、公共产品提供能力不足和缺乏自发性组织网络)包容所有群体,便会采取排斥其他族群的政策;^②菲利普·罗斯勒研究了当代的非洲政治,发现政府的排斥政策主要是为了预防少数民族精英发动政变;^③哈里斯·米洛纳斯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巴尔干半岛,发现国家的修正主义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少数民族与敌国共谋的威胁导致国家更多采取了排斥政策;^④康宁汉姆对二战后的自决运动进行系统性研究后发现,自决运动族群的内部越团结,国家权力太集中或太分散,排斥政策(非包容政策)的概率就越高。^⑤从上述著述中可以发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呈现出有趣的现象:其一,不同的学者讨论了不同时空下的案例;其二,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同时受到案例选择的影响,这些学者考虑了从国家关系、国家到(亚)群体层次的不同影响因素。这些现象既表明了族群排斥政策的复杂性,又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该问题和做出新的研究提供了基石。

其次,族群冲突中涉及的第二个重要行为体就是少数民族以及代表少数民族的反叛组织。在承认了不满和贪婪并不存在竞争性关系,动机和机会对于族群动员同样重要之后,目前的研究正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少数民族在冲突中的动态表现,这对我们进一步分析群体层次的动态非常有价值。其一,越来越多的文献将族裔反对派当做一个重要的战略行为体,分析其使用的各种战略:联盟和竞争机制^⑥、反对派外交^⑦、治

① Lars-Eric Cederman, Andreas Wimmer and Brian Min,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Lars-Eric Cederman, Luc Girardin and Kristian S. Gleditsch, "Ethnonationalist Triads: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Kin Groups on Civil Wars", *World Politics*, Vol.61, No.3, 2009, pp.403-437.

② Andreas Wimmer,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③ Philip Roessler, *Ethnic Politics and State Power in Africa: The Logic of the Coup-civil War Trap*.

④ Harris Mylonas, *The Politics of Nation-Building: Making Co-Nationals, Refugees, and Minor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 Kathleen Gallagher Cunningham, *Insides the Politics of Self-determination*.

⑥ Christia Fotini, *Alliance Formation in Civil War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⑦ Reyko Huang, "Rebel Diplomacy in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0, No.4, 2016, pp.89-126.

理战略^①、从非暴力到暴力甚至恐怖主义在内的多种战略的使用;^②其二,若干重要文献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讨论了(族裔)反对派组织或武装团体的形成和特点。本文想强调这是一个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③珍妮·刘易斯和珍妮弗·劳森的一系列研究考察了在冲突研究中这一几乎被完全忽略的问题——反叛组织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既有研究中存在的大规模案例选择偏误,即只关注了那些发展壮大后的武装组织,而忽略了那些在初期就失败了的武装组织。她们发现,大众社会中的网络结构决定了反叛组织能否从最开始的小团体成长为具有挑战政府能力的武装团体。具体而言,同质化的族裔网络有利于这种成长;^④刘易斯进一步使用自己收集的乌干达的数据库挑战了被广泛使用的“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中关于该国的资料以及基于该数据库的实证研究。她发现该数据库忽视了一批“失败”比较早的叛乱组织及其行为,而将这些失败组织纳入分析后,可以发现,塞德曼等人关于排斥性政策和叛乱爆发之间的相关关系几乎消失。^⑤刘易斯和劳森的研究表明,对叛乱如何形成的微观探索是新的研究乐土,并提醒我们需要反思当前学界对族群、族群组织和叛乱组织的基本定义和假设。

最后,第三方因素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机制也是目前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但对第三方行为体的研究显得纷繁芜杂。这是因为第三方行为体本身类型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全球性因素、外部国家和外部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性因素方面,研究者发现,民族国家的建立会影响国内冲突,^⑥冷战的结束导致国内冲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⑦但冷战后的国际机制降低了国内冲突的爆发频率,^⑧民族自决运动和全球化却促

① Ana Arjona et al. eds., *Rebel Governa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Michael C. Horowitz, Evan Perkoski and Philip B.K. Potter, “Tactical Diversity in Militant Viol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7, Forthcoming; David B. Carter, “Provocation and the Strategy of Terrorist and Guerrilla Attack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0, 2016, pp.133-173.

③ 例如,保罗·斯塔尼兰讨论了反对派武装形成的社会基础及其对后续命运的影响。Paul Staniland, *Networks of Rebellion: Explaining Insurgent Cohesion and Collap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④ Jennifer M. Larson and Janet I. Lewis, “Rumors, Kinship Networks, and Rebel Group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2, No.4, 2018, Forthcoming.

⑤ Janet I. Lewis, “How Does Ethnic Rebellion Star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0, No.10, 2017, pp. 1420-1450. 类似的研究,参见 Kathleen Gallagher Cunningham and Jessica Maves Braithwaite, “Foundations of Rebel Group Emergence (FORGE) Database”, Forthcoming Project.

⑥ Andreas Wimmer, *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

⑦ Stathis N. Kalyvas and Laia Barcells,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echnologies of Rebellion: How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haped Inter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4, No.3, 2010, pp.415-429.

⑧ James D. Fearon, “Civil War an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Daedalus*, Vol.146, No.4, 2017, pp.18-32.

进了少数族群对政治自治权的追求。^①具体到国家间层次,一方面,国家会更多地支持对手国国内的(族群)反对派组织,^②为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寻找代理人。^③另一方面,外部国家并非一定会支持反叛组织,有时也会支持处于危机中的中央政府,从而避免后者陷入内战。^④在外部非国家行为体方面,跨国界的同族裔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动态一直受到大量关注。最近的研究表明,一国(族裔和非族裔)内战的发生概率与邻国同一族群(Transborder Ethnic Kins Group)的相对大小成倒U型关系。^⑤对涉及第三方因素的研究进行归纳后可以发现,总体上外部因素对国内族群冲突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全球性因素通过影响国家身处的制度性或权力性环境来影响国家内部冲突,国家层次的因素更多地反映了国家间的竞争的国内化问题,包括跨国同族裔群体等外部非国家行为体具有超越主权边界的浸入效应,似乎很难将这些研究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但是,回顾本节分析,探究第三方因素如何通过影响国家中央政府和国内少数族群的战略行为来导致或遏制某种具体类型的族群冲突将是有趣的尝试。

四 结论

回顾族群冲突的研究历程、现状和趋势,不难发现族群冲突学界已经度过了随意提出无系统证据的理论或是盲目使用定量方法验证假设的阶段,而好研究往往需要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同时提供新的知识。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提出了一些推动族群冲突研究的建议,如重视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和误解的理论化问题等,并就方法、数据和研究议题等方面为未来的研究指出若干可能的领域和方向。

第一,研究的理论化和实证检验必须更紧密地结合,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同时深及根本的方向。实证假设只能抓住实证规律,而理论的目的是解释这些实证规律。^⑥因

① Ryan Grauer and Dominic Tierney, "The Arsenal of Insurrection: Explaining Rising Support for Rebels", *Security Studies*, 2017, Online First Version.

② Zeev Maoz and Belgin San-Akca, "Rivalry and State Support of Non-State Armed Groups (NAGs), 1946-2001",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2012, pp.720-734.

③ Idean Salehyan, "The Delegation of War to Rebel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4, No. 3, 2010, pp.493-515.

④ David Cunningham, "Preventing Civil War: How the Potential for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Can Deter Conflict Onset", *World Politics*, Vol.68, No.2, 2016, pp.307-340.

⑤ Lars-Erik Cederman et al., "Transborder Ethnic Kin and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7, 2013, pp.389-410.

⑥ Mario Bunge, "Explanation and Mechanism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27, No.4, 1997, pp.410-465.

此,在理想情况下,理论应该支持实证假设,而假设应源于理论核心。然而,大量的(定量)研究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罗列各种假设,但从未想过应该从一个理论内核中推导出自己的假设。因此,这类研究往往有将“提出实证假设”等同于“理论化”之嫌,最多只能算是低度理论化:绝大部分此类研究的结果不过是相关性分析。^① 这严重阻碍了该领域的知识积累,^②致使改变势在必行。

第二,我们必须弄清楚每种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尤其是定量研究的知识,这是补救措施,也是基础性的。首先,我们必须避免“垃圾”回归,在把各种因素放入回归方程之前应认真遴选,区别中介变量和混杂变量,并尽力处理好这些“自变量”之间潜在的、复杂的交互关系。^③ 其次,结合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其他方法肯定优于单独使用定量方法,^④因为大多数时候,就像罗斯勒等学者强调过的,定量分析仅仅揭示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⑤ 举例来说,通过比较定量分析结果和得自过程追踪的证据,唐世平、熊易寒和李辉的研究表明,尽管数篇相关研究都表明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战争的爆发之间存在稳健的统计关系,但石油更多只是族群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而非族群战争的深层原因。根据他们的研究结论,用深度案例研究去检验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定量研究的结果是非常有益的。^⑥

第三,我们需要收集数据,以测量族群的政治烈度,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因为族群战争很少会突然爆发,而若干年的低烈度族群政治很容易逐步升级并最终激起暴力冲突。^⑦ 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政策方面,理解那些尚未爆发族群战争的低烈度族群紧张局势会在何时,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最终升级(成为族群战争)或降级就变得十分必要。

① Shiping Tang,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pp.258-259.

② Håvard Hegre and Nicholas Sambanis,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Empirical Results on Civil War Onse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0, No.4, 2006, pp.508-535; Jeffrey Dixon, “What Causes Civil Wars?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Finding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1, No.4, 2009, pp.707-735.

③ James L. Ray, “Explaining Interstate Conflict and War: W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for?”,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0, No.1, 2003, pp.1-29; Christopher H. Achen, “Let’s Put Garbage-can Regressions and Garbage-can Probits Where They Belong”,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2, No.4, 2005, pp.327-339; Jeffrey Dixon, “What Causes Civil Wars?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Findings”.

④ Jason Lyall, “Process Tracing, Causal Inference, and Civil War”, in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T. Checkel eds., *Process Tracing: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al Too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86-207.

⑤ Philip Roessler, *Ethnic Politics and State Power in Africa: The Logic of the Coup-civil War Trap*; Shiping Tang, Yihan Xiong and Hui Li,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s from Quantitative and Process-tracing Exercises”, *Security Studies*, Vol.26, No.3, 2017, pp.359-390.

⑥ Shiping Tang, Yihan Xiong and Hui Li,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s from Quantitative and Process-tracing Exercises”.

⑦ Nicholas Sambanis, “Using Case Studies to Expand Economic Models of Civil War”, p.265.

第四,无论从实证、理论还是政策层面来说,检验不同政体中“族群政治”和“社会政治权力”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都能产出优秀的研究成果。例如,哈克尼斯和罗斯勒分别讨论了多族群国家内来自国家和精英的权力政治怎样影响族群政治、影响族群政变和战争的发生。^① 这种研究路线将把族群冲突和比较政治领域的其他关键话题聚合在一起,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的交叉领域。

第五,我们乐观地认为,冲突预测研究将前景光明。对族群冲突爆发的研究本就包含预测目的,我们一直希望能利用研究成果来采取冲突预防措施。然而直到最近,这方面的努力也仅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在高速发展的计算社会科学,以及在我们不断积累起来的有关族群战争的理论 and 实证知识的帮助下,也许能在不远的未来最终走上成功之路。^②

最后,正如格尔多年前首次提出的那样,我们希望,族群战争的爆发频率可能已经在稳定地降低了。^③ 最近,基于更系统的数据和分析,赛德曼等人的发现为格尔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④ 如果他们都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然而不管族群冲突是否已经并会继续减少,通过族群和解重建敌对群体之间的和平这个话题在比较政治和国家关系领域依旧被严重忽视,我们认为对这个话题的研究应该成为另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⑤ 毕竟,在很多多族群国家,族群暴力和战争往往会反复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立族群间的深度和解,才能为族群间和平打下基础。

(作者简介: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王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莫伟)

① Kristen A. Harkness, “The Ethnic Army and the State: Explaining Coup Traps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0, No.4, 2016, pp.587-616; Philip Roessler, *Ethnic Politics and State Power in Africa: The Logic of the Coup-civil War Trap*.

② 参见《和平研究》杂志2017年特刊: The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17.

③ Ted R. Gurr, “Ethnic Warfare on the Wane”,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3, 2000, pp.52-64.

④ Lars-Eric Cederman, Kristian S. Gleditsch and Julian Wucherpfennig, “Predicting the Decline of Ethnic Civil War: Was Gurr Right and for the Right Reas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4, No.2, 2017, pp.262-274.

⑤ Shiping Tang,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Vol.63, No.4, 2011, pp.713-751.